

论知识分子与农民政治

——容闳与洪仁玕的现代化方案及其遭遇

19 世纪 50—60 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轫与启动的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无论其归属于哪一个阵营（清政府抑或是太平天国），由于受欧风美雨的冲击，感于中华帝国的内忧外患，因而大都希望师夷之长技，变贫穷为富强。在曾国藩与其他洋务大员们展开自强运动之前，容闳与洪仁玕则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并寄情于农民领袖洪秀全。但正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粉碎了他们的近代化之梦，这充分说明农民政治与知识分子及其近代化理想的复杂关系。此后，“迷途知返”的容闳，转而投身了曾国藩阵营，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他的理想。这一遭遇从另一角度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诸多的内涵与变量，不能不令人深思。

—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大凡曾经有过一定气候的农民战争及其政权，都正确地实施过各自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在这些农民起义军和农民政权中，知识分子运用其智慧与知识，为农民战争的胜利和农民政权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知识分子因其掌握了专门的知识，尤其是掌握了被传统社会所认可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博文通史，对历代的兴亡盛衰、治乱得失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必然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种政治改革者或野心家争取的对象。对于农民政治来说，由于其基本的政治力量是在封建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贫苦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们虽然具有直觉与强烈的反抗现状的要求，但缺乏统筹

政治、治国兴邦的文化经验。因此，他们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封建社会中虽然整体上是依附于封建政治的附庸，但是，诸如洪秀全之类的“怀才不遇”的落第士子，或同情农民贫困的遭遇、不满封建苛政的正直士人，或者在王朝末期失望于旧王朝“气数已尽”，渴望扶植新王朝上台并在其中分享利益的士人政客，等等，不论其初始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形成了对现实（即所谓“当朝”）政治不满与反叛的力量，他们也希望参与或依附于新的政治力量，以求得社会改进或者是个人遭际的改善。这样，农民政治与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沟通的渠道，形成了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有知识分子参与的调整或变革封建政治机制的力量。这样就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的改朝换代的政治事件和血流成河的政治悲剧。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政治与历史上无数希望建立新王朝的农民战争一样，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种需要的客观因素，而鸦片战争后动乱的社会也提供了一大批不满于社会现状的文人儒生。因此，在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旗帜下，洪秀全与这些知识分子便找到了共同的政治语言。

但是，农民政治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封建政治的范畴，农民阶级不可能建立长久的属于自己的政治制度，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也无法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框架建构自己的经济基础。因此，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结局不是走向失败（包括被“招安”）就是胜利之后逐步向封建性质转化，成为无数王朝中的新的一个。所以，农民的政治文化，也只能是沿袭着封建时代的传统模式。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们与封建帝王和封建政治家一样，只能是将其纳入帝师王佐、幕宾、笔手一类角色中，在这种政治文化中，知识分子依旧处于依附的状态，并没有对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起到更为独立与强大的作用。

无疑，太平天国政权对待帮助和参加他们事业的知识分子是优礼以加的。但是，这仍然脱胎不了封建政治“招贤纳士”的传统思维模式。事实上，从有关材料来看，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也大多只是停留在让他们充当文书、手书、掌书之类的配角地位，能够参与军机大事与重要决策的现象是相当罕见的。有人曾将这一点当作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深一层的疑问是：并非农民政治能够提供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农民政治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超出封建统治所能提供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那样的范畴。这是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最终极限。曾经受过资本主义文化濡染的洪仁玕，在他主持制定的《钦定士阶条例》中，曾经提出

“士居四民之首”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太平天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变化，如同他提出的许多带有近代色彩的方案一样，这一概念当然不可能植根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土壤中。农民政治与知识分子的悲剧冲突就在这里。

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面临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大变局，士林风气正处于变化状况之中，少数敏锐与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面向世界，探寻中国的未来，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先进的部分。但是由于中国面向世界的幅度还是相当小的，新的经济因素尚未出现，知识分子的主流还属于传统类型的，没有足资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近代意识与观念。因之，以传统的反叛方式出现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治，实际上也恰好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场所。不论是站在太平天国立场上支持和拥护农民战争，并为之献身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清朝当局一边，为消弭农民起义而出谋划策的文人儒士，如果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只是在为着一种早已为先进的西方所抛弃的封建制度而奔走呼号，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由于其内部发展与外部的冲击也已经显现出衰亡的趋势。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企图以一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尽管新王朝或许能以解决土地问题和社会贫富不均而有利于农民群众；而后者则是维护旧王朝，使其苟延残喘。因此，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来考察，当时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只能充当农民政治的配角，满足于为农民政权“设策献谋”的“先生”地位。特别是那些在清朝功名场上不甚得志的寒微落第之士，以及那些“匡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狷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①，那些乡村塾师、店伙、账房之辈，甘为前驱，“虽纵不逃”^②。他们投身于农民战争，或基于自身的贫寒生活而产生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求得自身地位的改善；或相信旧王朝“气数已尽”，新天子已经降临而甘为前驱。然而，不论何种动机和心态，他们无非是为自己在新王朝挣得一官半职，即或是为了建立一个太平治世，他们的模式也只能是传统封建社会“盛世”的所谓小康社会，仍然是使在中国持续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延续下去，而这种既成的政治机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東西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农民政治，其固有的传统政治机制不能够将中国导向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近代政治状态，因而也不能给知识分子提供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伪科目》卷12，《杂载》。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伪科目》卷12，《杂载》。

发挥政治作用的舞台；而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主流，也依旧囿于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只能起到在封建传统社会中所能扮演的帝师王佐的角色，这便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治与知识分子相依存的关系。容闳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揭示了这种现象。

二

容闳是一个西化了的、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意识而又对中国充满热爱之情的知识分子。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所以从小就进入了外国人创办的学校，期望将来能在英国人家庭当仆人，但由于他天资聪明，传教士布朗对之颇为赏识，因而资助他读完小学、中学，并带他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八年，先后就读于芒森学校和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由于容闳长期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广泛地阅读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亲身接触、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文教制度均有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西化的性格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同时，祖国的贫困与落后，又使他产生了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和宏大抱负——“为祖国谋福利”^①。他希望变革中国，使之变为如西方国家那样文明与强大。因此，他放弃了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回到了祖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得以维新，文明强大起来”^②。1855年，容闳回到了中国，可是在随后的四五年里，严酷的现实使他深感失望，他不能实现他自己的革新计划，看到的只是清政府的腐败颓废和残忍凶恶，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他便产生了投效太平天国的想法。据容氏自己声称，他与后来主持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在香港曾晤谈过。据此，应当是洪仁玕昔日的言谈与思想观念的某些影响，促使他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某些好感，因而想借太平天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使中国走上文明强大的道路。^③

1860年11月，容闳到达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在那里，容闳通过观察，感到太平天国对人民“甚平和”，并初步意识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必然性，“即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①。抱着这样的认识，容闳希望太平天国成功，并满怀热情地向天国领导人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的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厘定度量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②

在政治上，容闳提出了建立一个“善良政府”的概念，容氏的英文原是 civil government，这是源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治学说，是指按社会契约的原则建立的保护财产、自由、平等等“不可转让的人的自然权利”^③的君主立宪制度。容闳显然是希望太平天国建立如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在经济上，容闳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式的近代银行的主张，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文化上，容闳建议建立近代化的教育制度，包括民众教育、军事教育和职业教育。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在留美期间，他就说过：“我确信中国的新一代也应当享受我所受过的教育利益。通过西方的教育使中国得以维新，文明强大起来。”^④

在军事上，容氏提出了建立西式的近代化军队和创办军事学校的主张，这也是改革中国军事制度的近代化方案。

从以上揭示的内容可以看出，容氏的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不尽全面，但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案。容闳对此方案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曾表示太平天国如果“采纳预言，愿为马前走卒”^⑤。然而，容闳的热情不久即熄灭了。根据容氏的记载，干王洪仁玕对这个方案曾与他“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⑥但是，干王的态度也仅此而已，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東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干王给这位耶鲁大学的文学士送来一颗长方官印，一个黄缎子铃记的第四等封爵的“××义”头衔。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③ 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⑥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容闳最终离开了太平天国。容氏认为，太平天国虽有许多令人钦佩的东西，但也具有两面性，特别是进入“财产富而多美色”的苏杭地区后，“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①显然，容闳终于认识到依靠太平天国并不能实现他的资本主义维新方案。然而，容闳并未意识到太平天国为什么不能接纳其方案的根本原因，他只是以道德判断太平天国未必能成功，他与具有资本主义意识的洪仁玕一样，同样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洪仁玕对容氏的方案，认为不可接纳的原因在于，“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②。

其实，容闳与洪仁玕都没有认识到，在农民政治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如前所述，农民政治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封建政治的范畴。无论太平天国领导人抱的何等善良与质朴的愿望，他们都只是在筑造一个新王朝的大厦，历史的惯性始终将会把他们推向封建政治的道路，与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农民战争一样：以反封建肇始，却以自身的封建化而告终。这看似一个循环不止的“怪圈”，实际包含着一个历史定理，当社会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容纳新的生产力因素的机制时，当掌握政权的政治家本身还只是属于旧有传统思维、道德体系时，任何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思想都只是一种空想。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真正资本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在太平天国的遭遇揭示了农民政治并不能为近代型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广阔的政治舞台，农民政治也不能将中国导向近代化的国家。耐人寻味的是，容闳在对太平天国失望之后，转而投奔了曾国藩，在随后的几年里，容闳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清代第一流人物”的身上。同样令人深思的是，容闳在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他的“西学东渐”的理想。这似乎更加反证了农民政治甚至也不会优于正在缓慢向近代化迈进的传统官僚政治。身兼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具有西方色彩的知识分子二重身份的洪仁玕以其在太平天国的经历，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② 洪仁玕：《自述》。

三

与容闳不同的是，洪仁玕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他“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习经史天文历数”，实际上也曾是一个名落孙山的科举士子。金田起义之后，洪仁玕因故未能赶上起义队伍，为逃避清方追捕而避居香港。这一经历，改变了他的思想，使他从一个儒家士子转变为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

洪仁玕在香港先后6年，在传教士家中教书，并学习天文、数学，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这块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上，洪仁玕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他们先进的社会管理及政治文化，这就使他具有了与洪秀全等单纯的农民知识分子所不同的独特思想色彩，即接受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不过，他又与容闳不同，容氏自小接受西方的教育，是一完全西化了的有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洪仁玕具有的这种农民知识分子意识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双重文化因素，使他有着与农民战争共命运的强烈意识和变革天朝政治的理想，终于在1859年初历经艰险返回天京，并提出了他的变革政治的方案《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开宗明义，指出：“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洪仁玕的“立政取资”的原则是什么呢？《资政新篇》给予了回答：“夫事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视而行而已。”显然，《资政新篇》的“立政取资”的原则，是审“时”度“势”。从洪仁玕的思想与《资政新篇》的内容来考察，洪仁玕强调的“时”与“势”，是指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列举了英、美、法等国的事例，认为它们是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国富民泰，俄国也因为学习西方政教而成为“北方冠冕之邦”；日本因与西方通商与学习西方，“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因此，洪仁玕认为，中国要独立富强，也必须追随世界的潮流，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洪仁玕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的内容，共分为四大类：“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

类”和“刑刑类”。其中，“法法类”是核心内容，它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政策的具体设想。

在经济上，《资政新篇》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措施，包括：鼓励民间开发矿产，凡金、银、铜、铁、锡、煤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探取”；开拓交通事业，“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之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发展金融事业，创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发展邮政事业，“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奖励技艺发明，“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他人仿做。”

在政治上，《资政新篇》虽然没有提出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但却主张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中。例如，《资政新篇》提出设立不受政府节制，能代表民意的监察制度——新闻官和意见箱，“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设立意见箱，可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又如，《资政新篇》还提出要杜绝官爵和贪污之弊，“兴省郡县钱谷库，以司文武官员俸值公费”，“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兴市镇公司，立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有为己私抽者，议法”，表明《资政新篇》所要求建立的是具有西方资产阶级色彩的“廉洁”政治。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显然与太平天国前期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倾向不同，后者主张的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要求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实行以平均主义为原则的财产平等，而前者却是在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资政新篇》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从林则徐到魏源，从容闳到洪仁玕，都代表着这一符合社会历史进步要求的潮流。这种社会进步的客观潮流，即使是属于传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也已经朦胧地感受到潮流的冲击，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先进的西方发生了兴趣。洪秀全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西方传来的《圣经》，而且还注意研读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侍王李世贤便“十分熟悉欧洲的政治，并且对于一般为中国人完全茫然无知的问题也

很精通”^①；忠王李秀成也常向传教士询问“许多关于外国机器的问题”^②；章王林绍璋“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地图的参考书”，并且“经常研读这些学问”^③；慕王谭绍光“常爱谈论欧洲政治与发明”^④。作为在香港殖民地生活过多年的洪仁玕，则是深切感受到这种趋势的杰出的农民知识分子。他“致力于基督教理之探究，旁及各种科学，而于外国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之观察与研究，尤有心得”^⑤，对“西方”之科学与文明，无不通晓。一位会见过洪仁玕的外国人说：“我不能不承认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开通的中国人。他极熟悉地理，又略识机器工程，又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家藏有各种参考书。对于各种题目，皆有研究的资料。”^⑥容闳也说洪仁玕“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⑦。

太平天国领导人对西方事物的兴趣与关注，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学习的客观社会历史潮流，这也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太平天国采纳的思想基础。洪秀全旨准颁行了这部书，使其具有与《天朝田亩制度》一样的重要地位。不过，虽然如洪仁玕对外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资政新篇》是天王亲自圣鉴的，已蒙旨准刻印”^⑧，但是，洪仁玕这位天朝的“马丁·路德”，并没能使他的方案在天朝实现。《资政新篇》在天朝被冷落的命运，一般认为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资政新篇》没有触及农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所以不能解决农民战争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太平天国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无暇顾及《资政新篇》所提出的任务。这种分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反映问题的实质。作为一个本质上仍然属于封建范畴的农民政权，能否采纳资本主义的方案，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或者说，在农民政治基础上能否完成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有必要考察一下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具体态度。洪秀全对这个文件确实作过仔细的斟酌与研究，并十分明确地在文件上作了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②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③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5页。

④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5页。

⑤ 简又文：《金田之游及其他》，第138页。

⑥ 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⑦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⑧ 《干王答客问》，《华北先驱周报》1860年8月11日。

细致的批示。在《资政新篇》全文上，洪秀全共批示了31处，从这些批示来看，显然，洪秀全所赞同的，大都是《资政新篇》在经济上和社会风俗方面的变革措施，修铁路、办工厂、设银行，这些在鸦片战争以后就逐渐为进步知识分子看做是西方强大的“夷人长技”，是洪秀全可以容纳的，其目的也无非是使“天国一统江山万万年”。至于那些“禁溺子女”“禁庙宇寺观”“兴鰥寡孤独院”之类的革除陋习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除旧布新的革新中也可以找到先例。

洪仁玕并没有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只不过在他的方案中闪烁着点滴的民主政治精神。然而，即使是这样，洪秀全也难以接受。对《资政新篇》的政治主张，洪秀全所赞同的，大都是“禁朋党之弊”“抑末（臣）强本（君）”“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之类拯救传统专制政治危机的药方，尤其是对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意见，洪秀全是完全赞同的，目的也只不过借集中统一之名，强化洪氏皇权而已。正因为如此，对于设立新闻监督、意见箱之类，建立“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的具有资本主义民主议政色彩的东西，洪秀全都以种种理由而加以拒绝。显然，洪秀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西方物质文明来维护其实质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新王朝，并非建立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

洪秀全的这种思想倾向，在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身上也同样有所表现。那些对西方不乏热情关注的天国诸王，对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特别是其中的政治主张，都有很大的保留。忠王李秀成就很不同意洪仁玕的政治主张，甚至对洪仁玕所编各书“皆不屑看”^①。洪仁玕曾向人表示“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权威”^②。“盖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也。”诚然，诸王的对抗情绪自有妒忌洪仁玕“无功受封”、位居第二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领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狭隘的政治文化，不能理解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东西。相比之下，这些农民领袖甚至连地主阶级中开明分子也赶不上。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读过《资政新篇》之后，也禁不住称赞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于西方之“长处颇能变通用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③看来，传教士所描述的农民领袖们

① 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② 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③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八），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对西方的热情，大抵不过因为同上帝，彼此兄弟的好奇罢了。

四

其实，传教士期许的“马丁·路德”——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在天国的冷落，并非取决于洪秀全及其他诸王的个人因素。这是时代与历史的悲剧：农民政治的基础上不可能建构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和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虽然他们是封建生产关系中地位最卑贱的部分，对社会现状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不是社会政治革新的体现者，不可能依靠自己独立地建立一个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农民政治基础上不能实现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时期，经过鸦片战争以来将近十年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中国必须冲破闭关的、保守的传统封建经济政治的框架，走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当然是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但是，社会大变局刚刚开始，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瓦解程度也很有限，先进的人士才刚刚开始将眼光转向西方与世界。这些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变更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缺乏实现资产阶级近代政治变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力量。

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后十年左右，中国社会依然被牢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只是在五口通商及其附近地区依稀出现了自然经济解体的某些因素，商品经济有了微弱的发展。内地地区自然经济的牢固，以至于西方的商品冲击受到强烈的抵制使对华贸易呈现出停滞的状况。西方列强不得不再次依靠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尚未发生大的变化。农民阶级虽然出现了一些在社会大变局中探索新的出路的先进人士，但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在整体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仍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仍然是中世纪式的农民。受这种整体利益群体的限制，也受到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民阶级先进人物本身所处的转变时期的性质的制约，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在形成和建立自己的政治变革目标时就必然代表和反映他们主体阶级的政治要求，必然是按照传统社会所赋予他们的既定模式来建构和制约其政治结构。

传统农民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 因此，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农民所要求的政治，实际上就是封建专制政治。他们在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要求的最多不过是所谓“清官”政治；当他们自己建立农民政权时，所依据的模式便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其实质也就是封建政治。洪秀全创立的太平天国，其政治制度无疑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复制品，是适合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的政治形式。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是，他提出的政治措施，是具有限制封建专制政治权力的因素的，或多或少带有若干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精神的色彩。因此，太平天国所代表的农民政治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便不可能容纳对其有削弱的机制的《资政新篇》的政治方案。这就是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容纳西方的近代物质文明，对修铁路、办工厂、设医院之类表示赞同，而对西方文明的文化基础——民主制度，甚至是若干民主的因素也不能接受的根本所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洪仁玕之所以在政治方面还落后于容闳，也是因为洪仁玕所接受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程度较之于西化了的容闳要深厚得多。

洪仁玕以《资政新篇》贡献于农民政治的祭坛，得到的是其政治理想的实际幻灭与自身回归于传统政治文化的结局；容闳在对太平天国失望之后，奔向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显著开创意义的人物——曾国藩门下，使其抱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这两位太平天国时期同样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命运，正好反观出曾国藩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原载《曾国藩学刊》1995年第1期）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